

论汉语的单音词

李如龙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 汉代之后双音词大量产生, 但直到现代汉语, 单音词仍是词汇系统的核心和语法系统的基点。西方语言学家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反映了早期汉语的特点, 后来虽然多音词大量增加, 语法手段也有所变化, 但以单音词为核心的基本风格还没有变, 这是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类型特征,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汉语; 单音词; 类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2009)02-0001-07

早期的西方语言学家曾经指出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 后来又有人以印欧语中心论把汉语列为比多音节、屈折语低级的语言, 于是, 中国的语言学家对于“单音节、孤立语”便讳莫如深, 努力去说明后来的汉语已经是多音词占优势了, 语法上也生长出许多“形态变化”, 这是抛弃汉语的特点、一味追随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思想在作怪。本文从考察汉语词汇演变的基本事实出发, 认为单音词自古至今都是汉语词汇的核心, 也是汉语语法手段滋生的基点。正是这些体现了汉语的类型特征, 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 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

汉语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已经发现的甲骨文虽有 4000 多字, 因受到占卜应用的限制, 反映社会生活的词语有限。要从中了解早期汉语的全貌是有困难的。甲骨卜辞中有没有复音词, 曾有过一些争议。除去人、地专名不论, “御史、大史、小史、上下、往来”等常见组合怕是很难说一定是词组。向熹曾做过概括的叙述: “甲骨刻辞所反映的商代词汇特点是内容相当广泛, 但是数量有限, 绝大多数是单音词, 复音词很少; 多数只有一个意义, ……就词性说, 名词最多, 动词次之, 形容词较少, 虚词更少些。兼类现象相当多。”^{[17] 365} 伍宗文也有过类似说法: “甲骨卜辞以及商代晚期铜器铭文中已有双音词, 并且都是名词, 所以只是复音词的萌芽。”^{[16] 324}

就先秦的传世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统计之后, 伍宗文认为, 西周时期“复音词的主要类型已经大体具备”, “到了春秋战国进入了第一高潮

期”。^{[16] 328} 他曾列了几部主要典籍的复音词所占比例(所统计的复音词已扣除方言):

表 1

书名	总词数	单音词	复音词	复音词所占比例
《诗经》	3450	2476	974	28.2%
《论语》	1479	1150	329	22.2%
《孟子》	2240	1589	651	29%
《左传》	4177	2992	1185	28.3%
《吕氏春秋》	3992	2844	1148	28.7%

先秦文献的双音词有许多学者作过统计研究, 据我们所作的比较, 虽然具体数字有些出入, 但总的说来, 以上统计数大体是可信的。

先秦的复音词虽然只占四分之一左右, 而就其造词方式和构词方式来说, 已经覆盖了后来的复音词的生成方式的大部分。主要构造方式是:

- 叠音: 关关、彬彬、巍巍、明明、滔滔
- 双声: 伊威、参差、果敢、辗转、邂逅
- 叠韵: 逍遥、凤凰、螟蛉、名声、禄爵
- 联合: 人民、朋友、计算、衣服、争斗
- 修饰: 大夫、小人、百姓、五谷、先生

其余构词法也开始露头了, 例如: 为人、立夏、牵牛、执事(支配); 走出、饿殍、战胜、防止(补充); 自爱、冬至、自杀、日蚀(陈述); 有殷、於越、于归、涟如、恢恢然、婢子、眸子、婴儿子(附加), 等等。

有些双音合成字的字序尚未稳定, 例如: 美好—好美, 长久—久长, 威严—严威, 粟米—米粟, 甲兵—兵甲, 学问—问学, 服从—从服, 计算—算计, 还归—归还, 等等。

伍宗文还指出一个重要事实:上古汉语的单音词不但数量占优势,而且使用频率比复音词高得多。他做过一个比较:

表 2

书名	单音词使用次数	平均	复音词使用次数	平均		
《论语》	1079	12690	11.8	329	838	2.5
《吕氏春秋》	2704	81400	30.1	1148	4165	3.6

据此,他认为“单音词在上古汉语明显占优势”,^{[16] 372}这一结论是符合先秦汉语实际的。

先秦的数百年间,中华民族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不论是《诗经》、楚辞,还是诸子的政论和散文,至今还闪烁着夺目的光辉。这些文化和典籍就靠着数千个汉字所标示的单音词,何以就能够表达出如此丰富多样的内容呢?关于这一点,也许可以做几点解释。

第一,上古汉语的音节有较大的容量。关于上古音系,目前尚无明确定论,但各家说法也相去不远,声母大约有 28—32 个,韵母在 28—29 部之间,每一个韵部之中还有开合,也许还分等,至于声调,许多学者都认为和中古音一样有平、上、去、入四声(《诗经》多按四声分别押韵就是最好论据)。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上古音有复合辅音。上古汉语声、韵、调组合的音节数可能在 2000 个以上。

第二,同样的音节可以有不同的汉字,用来区别同音异义的单音词。例如:来徠莱(来母之部、平声),会佺脍(见母月部、去声),专颛转(章母元部、平声),阻俎(庄母鱼部、上声);有的字可以用不同韵母(阴阳对转)或声调变化(四声别义)来区别不同的词义,例如:能,奴来切,又奴登切(之蒸对转);喁,鱼容切,又元惧切(侯东对转);贲音奔,又音肥(微元对转);好、饮(上、去两读),听、看(平、去两读),沈(平、上两读),则是一直传到现在的别义异读的单音词。

第三,不少同形、同音的单音词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成为多义词,有的不同义项之间还有较大的跨度。例如疾:①病《论语》:“曾子有疾”,②痛恨

表 3

书名	总字数	双音词数	语音造词		语法造词							综合式
			单纯	重叠	联合	偏正	补充	支配	表述	后缀	前缀	
《论衡》	21 万余	2300	75	26	1404	517	101	52	14	61	2	48
《世说新语》	6 万余	2126	58	71	926	573	93	77	17	75	23	213
《变文》	27 万余	4347	163	241	2113	800	194	170	40	265	51	310
《行记》	8 万余	4074	56	15	1296	1729	263	214	23	108	36	334

以上资料引自程湘清的《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2003)及董志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2000)。对此,向熹也作过如下总结:“中古汉语复

(《孟子》:“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③快速《庄子》:“不徐不疾”。又如固:①坚固《论语》:“今夫颡臾,固而近于废”,②坚决《战国策》:“孟尝君固辞不往也”,③本来《孟子》:“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再如“子”,可指儿子,可指女儿,可作男子美称(先生),还可表爵位,也作为地支名。

第四,自从汉藏语比较研究广泛开展以来,中外的许多名家对于上古音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有成效的探讨。有几个要点已经为许多专家普遍认同:汉语和藏语是根据最充分的有同源关系的亲属语言;一千年前创制的古藏文是拼音文字,所记录的古藏语是准确的,且与现代藏语有明确对应关系,所标记的音和古藏文以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也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藏文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有 b-、d-、g- 等塞音前缀, l-、r- 等流音前缀和啞音、鼻音前缀,有塞音带 l-、j-、r-、w 的复合辅音,有 -b-、-d-、-g-、-m-、-n-、-l-、-r-、-s 等辅音韵尾,但没有声调。在这方面,潘悟云在他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中曾介绍过数十年来中外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也表明了他的观点。诸如:上古音是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蜕变期,去声字是从早期 -s 尾变来的,上声字曾有紧喉音,声母有不少复合辅音,还有一些形态变化的遗迹等等。^{[12] 154-159}这也可以说明,上古时期有数千个汉字所标记的常用单音词,确实是可以富有表现力的。而且可能正是表义的汉字,抑制了用形态手段派生多音词的造词方式,使汉语定型为“单音节”的孤立语。换言之,汉语的“单音节制”未必是与生俱来的。

二 汉代之后双音词的大发展

汉魏六朝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发展的几百年。从单音词占优势到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就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转变的基本事实之一。汉以后的专书词汇研究成果不少,下文先将程湘清所作的系列调查和武建宇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和尚圆仁用唐末北方口语所写)的调查所得数据列表比较如下:

书名	总字数	双音词数	语音造词		语法造词							综合式
			单纯	重叠	联合	偏正	补充	支配	表述	后缀	前缀	
《论衡》	21 万余	2300	75	26	1404	517	101	52	14	61	2	48
《世说新语》	6 万余	2126	58	71	926	573	93	77	17	75	23	213
《变文》	27 万余	4347	163	241	2113	800	194	170	40	265	51	310
《行记》	8 万余	4074	56	15	1296	1729	263	214	23	108	36	334

音词有了全面的发展。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复音词,成为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现代汉语所有的双音词结构,中古都已具备。其中以联合式、

偏正式复合词最为重要, 占中古汉语复音词总数的80%以上。”^{[17] 516}

唐代之后, 双音词的发展就更加迅速了,《宋语言词典》“收词原则以宋代新词、新义为主, 一些后代少见而宋代使用较多的词语、词义也酌情收入。虽属上述范围, 但现代汉语仍在使用, 一般读者见词明义者基本不收”,^{[10] 11} 按照这样的原则, 该书新收词条就有4100多条。

赵克勤(1994)曾经就唐代书面语拿韩愈、柳宗元的三篇散文作了抽样调查。这三篇散文中扣除人名地名之外, 出现的双音词有140个, 其中先秦已见的占45%, 汉唐间增加的占15%, 唐代新创的占40%。韩、柳是中唐的人, 唐代不到二百年所新增双音词数量就与先秦的八百年已有的相接近, 可见其增长之快。

关于近代汉语, 徐时仪说:“古白话中复音词占了绝对优势, 并大量进入了基本词汇范围。复音词的大量产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特点, 也是古白话词汇的重要特点。古白话词汇广泛使用词头、词尾子、老、头、打等以创造新词, 构成派生词。”^{[18] 11}

然而, 先秦出现的占四分之一左右的双音节词和两汉之后成熟、唐宋之后迅速发展的双音词是不是一回事呢? 应该说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双音词的兴起, 从造词法来分, 有语音造词和语义造词两类。语音造词包括叠音词和联绵词两类。联绵词多半是双声或叠韵, 其实也就是不完整的重叠式, 也可以称为半重叠式。所谓语义造词就是运用词汇和语法手段构成联合、偏正、支配、补充、陈述等结构关系的双音词或附加前后缀的双音词。在商周的“萌芽期”, 复音词主要是名词中的偏正式和并列式, 都属于语义—语素造词。甲金文中发现的叠音词和联绵词极少。周康王时的《沈子也簋》的“晏晏”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重言词”, 西周铜器铭文中还有“穆穆、桓桓、宪宪、异异”等十多个。^[7]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传世文献, 叠音词、联绵词这类用语音造词法生成的复音词就明显增多了。“关关、窈窕、战战兢兢”(《诗经》), “兢兢业业”(《书经》),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 “徜徉、绸缪、从容、踌躇、徘徊、陆离”(《尔雅》)都已沿用数千年, 是大家熟悉的。但是汉代之后, 情况又有了变化: 语义造词的复音词逐渐上升, 语音造词的复音词则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根据向熹和程湘清的统计数字可列表比较如下表4:

表4

	语音造词	语义造词	语音造词所占百分比
《诗经》	451	1036	43.5%
《论语》	42	138	30%
《孟子》	84	249	33.9%
《论衡》	101	2151	4.69%
《世说新语》	129	1784	7.23%
唐代	404	3633	11.1%

为什么会在数百年间发生了汉语造词法的这两个大变化——从单音词占优势到迅速兴起双音词, 而双音词中则从语音造词为主转变为以语义造词为主?

如果说, 上文所述关于“早期汉语和藏语关系密切、是对应明显的亲属语言”的论断是合理的, 那么, 甲骨文出现之后的汉语, 可能就在一千多年之间发生过一次类型上的转变: 从无声调到产生声调, 从有屈折变化到孤立语, 从有复合辅音、有多音词到丧失复合辅音并变成单音词占优势。那么这个转变的直接原因便是中国的先民发明并使用了表义的方块汉字。不便于表音的汉字向着表意的方向愈走愈远, 形成自己独有的把字形、字音和字义结成一体的文字体系。同时也使汉语更加明确地形成“单音节的孤立语”的格局。这种文字开始时只掌握在少数巫者和史官的手上, 对于语言难以发生重大的影响。经过商周一千多年的积累,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治的集中, 文化教育也进步了。甲金文演变为小篆和秦隶, 文字也逐渐普及了, 并和语言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表义的合成词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便是汉字发展为成熟的表意文字并反作用于汉语的第一个标志, 也是汉字和汉语完成的第一次和谐统一。

三 单音词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和语法系统的基点

单音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有许多特性: 稳定、常用、能产、多义、多音。以下数据大体可以说明。

1. 据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所编的《最常用的汉字是哪些——三千高频度文字字表》, 最高频的300个字中, 独体字和笔划少的字都占有较大的比例:

表5

字频序号	独体字数	平均笔划数
1—50	30	5.38
1—100	46	6.13
1—250	95	6.72
1—300	133	6.87

上表说明, 越高频的字越古老, 因为造独体字总是先于合体字, 而越古老的汉字其笔划数也越少。

2. 斯瓦迪士200核心词在上述三千字表的高频字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6:

表 6

词频序号	核心词数	例字列举
1—50	16 个	一在不和人这打我他来们地对年说种
50—100	8 个	多三里如水二小都
100—150	12 个	好因天四那平重新数心你看
1—651	100 个	
1—956	135 个	
1—1250	150 个	

表 6 说明,越是常用的字,有越多的核心词。核心词是生活中最必需的概念,也是最古老的词。

3. 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所示,1500 个高频词中的单音词和双音词的比例如下表 7:

表 8

常用字构词频次	构词条数	常用字列举
1—10	668—209	子不大心人一斗气无水
11—25	201—143	地色天生自手工小发下行动长然(只列高频字,下同)
26—50	143—117	风而上得打口有力意化出机火花电老
51—70	117—100	红会文中明道开重家事法眼作油时声东石用后
71—274	99—50	说可过为国是里看多着要和能
275—500	49—34	在没想了就去么走的从

不同构词能力的字在文本中出现的字次是另一现字次在 1000 次以上的有 22 个常用字,如表 9:

表 9

常用字	不	大	人	一	地	上	有	来	说	是	看
构词频率	2	3	5	6	11	28	32	44	89	149	196
构词条数	500	296	278	275	201	140	135	121	89	70	59
出现字次	24773	12281	17585	33217	12809	12961	17762	14775	10406	27611	11433
常用字	在	了	就	的	到	个	这	们	我	他	你
构词频率	303	375	414	480	507	645	675	1259	141	2280	2281
构词条数	46	41	38	34	33	27	26	14	11	5	5
出现字次	19443	30848	11293	75306	10388	13630	16749	14961	23226	16043	10948

表 9 说明,不论是构词条数或文本中的出现字次,位居前列的都是那些常用的、能单说的单音词。

单音词数量不大,使用量却很大;双音词数量最大,使用量不小,其余的词语数量和使用量都很少。

表 7

词频序号	单音词	双音词
1—100	85	15
100—200	76	24
200—300	66	33
300—400	50	49
400—500	56	44
1—500	333	165
500—1000	231	266
1000—1500	195	323
1—1500	759	751

表 7 说明:越是常用的词,单音词所占比例越大。在 500 个高频词中,单音词的总数比双音词多出一倍。一千个高频词之后双音词才大幅度增加,到 1500 号,双音词才和单音词平分秋色,数量相当。

4. 关于常用字的构词能力,《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为我们提供了以下数据:

各类词数和用词次可做如下(表 10)比较:

	单音词	双音词	三音词	四音词
词数/百分比	3571/11.6%	22941/74.3%	2374/7.7%	2010/6.5%
词次/百分比	845366/64.3%	451048/34.3%	12274/0.9%	5506/0.4%

可见单音词的词数比例和词次比例是很不相同的。

5. 以下是两篇现代小说的抽样调查(表 11):

虽然单音词绝对数量只有 1/3 左右,但使用频率(覆盖面)都在 60%以上。这说明,虽然时代不同,作家风格不同,但是单音词在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十分一致的。单音词一直是汉语词汇的核心和重心。

表 11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总字数	9457	11208
词数(用词数)	1368(57.62%)	1827(65.01%)
单音词(占用词数)	498(64.4%)	583(62.1%)
单音词(占词目数)	(36.3%)	(31.9%)

为什么说,单音词又是汉语语法系统的基点呢?

胡明扬说过:“语言的直接存在形式是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语汇。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绝大部分信息也是语汇负载的。可以说,离开了语汇就无所谓语言,更无所谓语法。”^{[9] 279}众所周知,汉语的语法手段最主要的是虚词和语序。虚词是汉语词汇中最常用的词,语序则是词汇的组合功能。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所统计,最常用的100个词里,近三分之一(30个)就是专用和兼用的虚词,而且大多是单音词。加上一些运用灵活的动词竟然占了一半(50个):

助词:的、地、得、着、了

介词:从、把、在、给、叫、对、用

副词:又、很、没、向、只、还、都、也、才、不、最、没有、就

连词:和、而

语气词:吧、呢

补足语:下、出来、起来、来、去、将、到、出、走

语缀:第、们、手、家、里、上、看、个

能愿动词:要、能、会、可以

可见,最常用的单音词不但是词汇系统的核心,滋生新词的原材料;为了满足词语和句子的各种组合的需要,不少单音节实词还增加了虚化义,也就是起粘合作用的语法功能。汉语里的虚词形成于不同时代,历史上也有过更替,总体上看,应是在近代汉语时期得到较大发展,于今还在继续。在虚实之间,历来就没有一刀两断的界线,而是一词多用、虚实兼用(例如,“把”可以说:车把,一把米,把门,把他请来)。汉语语法的有界和无界,其源盖出于实词虚化是一个“斩不断,理还乱”的连续体。研究汉语语法不能净在组合形式上下功夫、找依据,而应该同时着力于实义虚化的性能和演变过程,如实地反映和解释这种状态。对于汉语来说,语法和语义、句法和词汇的研究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至于用“语序”来区分语法关系,其实也是和词汇的语义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把词义分成本体义和关系义,许多麻烦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不论是单音词或是用作语素的字,都有本体义和关系义。本体义是词汇意义,关系义是语法意义。汉语的本体义和关系义是相生、相异而相容的,有时,本体义和关系义结伴同行。例如,“一把米”的“把”置于数、物之间,表示“量”,“把门”的“把”置于处所之前,表示“把持”,“把他请来”的“把”置于人、事、物之前,表示“处置”。有时本体义和关系义是分离的。例如,“好人、人好”本体义相

同,关系义不同;“好听、好做”关系义相同,本体义不同;“好说,说好”本体义和关系义都不同。研究汉语的语法、语序,只能把这两种意义结合起来,如实地去理解和说明“兼类”“活用”的种种现象,才能达到理论上的通透。教学汉字和汉词,若能把两种意义联系起来,同步进行,也就能一通百通,得到左右逢源之乐;如果割裂开来,就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顾此失彼,不得要领,越搞越糊涂。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发挥。

四 深入理解汉语的“单音节的孤立语”的类型特征

如上文所述,虽然汉唐之后兴起的多音词到了近代蔚为大观,但单音词自古至今一直占领着常用词、基本词、虚词的核心位置,双音合成词中的语素也是以能产的单音语素为大宗,而语法结构的方式则以语序(关系义)和单音常用词虚化而来的虚词为主,这不正证实了早年西方学者为汉语所认定的“单音节的孤立语”的模式吗?

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在古代汉语是相当准确的,到了现代,虽有种种局部的调整,也还是基本如此。本来这种说法并无大错。

现在看到的关于汉语是“单音节孤立语”的早期详细论述是1735年巴黎出版的杜赫法神父(Peer Du Hable)在他所编的号称“中国百科全书”的百万言巨著《中华帝国通史》。书中说:“这种语言由单音词组成,没有语法形态变化,几乎不受任何规则约束,不过,名词、代词、动词变化形式,介词、副词、数量词、虚词还是有些规则的。”“通过将单音节字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创造出常规的对话,非常清晰,十分优美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汉语建构中的风格很神秘、简洁,寓意很深……作品言简意赅,表达生动富于活力,常常暗含着大胆的对比和壮观的比喻。”^{[20] 495-508}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刚到中国,恰逢康熙盛世时对汉语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理解。

稍后,德国的语言学理论家洪堡特从类型学角度指出了“汉语与梵语的对立最为尖锐”。汉语“缺乏语法标记……运用了一些语助词,……利用下列方式表达所有最广义上的语法形式:词序;词只运用于某个一经确定便永不改变的形式;意义之间的联系”。对于这样的语言类型,他作了两方面的评论,肯定了“具有高度的结构一致性……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非语音的方式来表示形式关系”。这些独到的优点使它“偏离其它语言的系统……使得汉语丧

失了许多别的优点”。这里已经表现了以印欧语为中心,以形态语言为正格的思想。但是他还是再三强调了:“由于缺乏语音标记,精神必须以更微妙的方式把形式关系跟言词联系起来……恰恰是因为汉语从表面上看不具备任何语法,汉民族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一种能够明辨言语中的内在形式联系的敏锐意识。”^{[8] 31-314}

到了19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代表人物施来赫尔(Angust Schleicher)于1850年以印欧语的形态为出发点把世界语言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三种类型,并认为这三种类型说明了语言发展的低级、中级、高级的三个阶段。其实,60年后,索绪尔就明确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说:“一成不变的特征是没有的;永恒不变只是偶然的后果;在时间的进程中保存下来的特征,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屈折结构的逐步弱化,在印欧系各种语言里是很普遍的……英语却正把屈折变化缩减成几乎没有什么了。”“施来赫尔把语言看作一种具有自己的演变规律的有机体,这是违反事实的。”^{[15] 323}1921年出版的萨丕尔的《语言论》更进一步批判了这种“进化论偏见”：“绝大多数的语言理论家说某种类型的语言,其中发展得最充分的样式是他们从小就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代表着迄今为止语言发展的‘最高’类型,而其他一切类型不过是走向边缘的‘屈折’类型的阶段。”“任何分类只要是从固执的评价观点出发,或者只是为了满足情绪,就自己注定是不科学的。”^{[14] 76}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第一位大汉学家高本汉又一次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透彻。他说:“中国语是单音缀的……又是孤立的……早先的学说把中国语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它还未进行变形(按即屈折变化)的阶段,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和印欧语演化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纯粹的论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5] 19-27}不仅如此,高本汉还根据汉语和藏语的比较进一步指出:“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在纪元前的时代,中国语的形式和声音,已经达到极单纯的局势;遂使其文字的结构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辗转循环,又影响于后来语言的发

展,至深且钜。”^{[4] 13-17}

高本汉的这两部著作是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80多年后,他所提出的汉字使汉语经历过一次从多音节、有形态到单音节、孤立语的类型转变,这种睿智的设想正在为汉藏系语言比较研究逐步地证实着。

虽然,施来赫尔由“进化论”引申出来的“孤立语低级”说已经被驳倒了,奇怪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对于单音节的孤立语至今还是讳莫如深,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现代汉语的“形态”,没有“狭义”的、“典型”的,能找几条“广义”的、“不典型”的也好。例如汉语方言中人称代词的“复数式”“所有格”,明明都是语根和附加语素合音了,却要说是“语尾的变化”、语音的“屈折”,以便贴上“形态”的标签。

汉语的“单音词”和“孤立语”所以经久不衰,至今还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占有核心地位,成为语法系统的基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形、音、义于一体的表意汉字,成了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

吕叔湘说:“语言的单位,常常讲到的有词、短语、句子等,这些是语法学家们用的名目,一般人脑子里大概只有‘字’和‘句’。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1] 40-46}不论是词、语、句,也不论是实词、虚词,都是由“字”或“字组”充当的。不论是词汇系统或句法单位,单音词占据了常用的基本词的核心地位,不论是合成词或是加缀的派生词,双音词都是两个单音词或单音语素组成的,其余三音词、四音词或句子成分、句子则全是由单音的字和双音的字组组成的句法单位。郭绍虞早在1928年就写道:“中国之复音语词,也以受方块的字形之牵制,只成为两个单纯化的声音之结合,其孳化的基础,依旧是建筑在单音上的。”“单复相合,短长相配,于是整齐中含铿锵,参差中合自然,而文章掷地真可作金石声了。”^{[6] 74}这就是汉语和汉字和谐发展的结果,这就是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自成一格的独特类型的本质之所在。这就是中国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生不息之道在语言结构规律、繁衍规律上的表现。单音词是一,双音词是二,单双音的配合是为三,一切词、语、句不都是由单双音之间的这种组合衍生出来的吗?

我们不应该回避或忌讳“单音节、孤立语”这一命题,应该理直气壮地去研究汉语这一独特的类型特征,为这种类型特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科学的和

文化的阐释。这里试谈谈汉语之成为典型的“单音词孤立语”的条件和过程。

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算起,汉字已有3000多年历史。商周的一千年间是古文字阶段。古文字的结构是从表形到表意,而后又增加表音成分的。裘锡圭说:“有人曾对商代后期甲骨文里已认识的那部分字的结构作过研究,发现形声字还明显地少于表意字。在周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形声字增加得非常快,新造的表意字则已经很少见。”^{[13] 32}周代产生的新字大多为形声字,东周之后义符超过了形符,形声字超过了表意字,这标志着汉字的成熟并且完成了和汉语的语素的相结合。到了秦汉的隶书出现,汉字可以写在简帛上,这说明汉字已从少数巫史手中走向平民。就汉字自身的体制说,字形稳定了,表意和表音都是和词相结合的,字的形音义融为一体,并和音节、和词统一起来,这便是汉字和汉语的结合方式。和其他纯标音的文字(不论是标音素或标音节)相比,都是截然不同的类型。

至于先秦典籍中存在的少量的联绵词,究竟是早期表音的复合词的残留,或是表意字之外的支派,值得另作研究和解释。

如上文所说,汉语语义合成的复合词从春秋战国开始产生,汉代得到了发展。洪堡特曾指出:“通过复合方式,可以产生出被认为是极其简单的概念,但这样的概念事实上都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概念组合而成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构成的词决不是简单词,一种语言也自然不会由于拥有复合词而脱离单音词的状态。”“要证明一种语言不是单音节的语言,就得要证实词的所有音素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表达意义,一旦分裂开来就没有意义。”^{[8] 255}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只有从拼音文字的视觉(音节不是意义的单位)出发,才能看清表意文字(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意义)的基本特性。虽然,复合词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汉语单音节词的性质,但是大大开辟了词语扩展的空间,使语言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能量,在汉语汉字发展史上还是发生了部分质变。在此基础上,从单音词到复合的双音词是“一生二”,单音词和复合双音词的种种连用,陆续形成了单双音组成的不同形式的节律词,便是“二生三”“三生万物”了。这是“单音词的孤立语”所发生的第二次质变。后来,还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陆续发生的实词虚化,形成了

前缀、中缀和后缀,这是第三次质变。尽管这些实词虚化了,还是以单音词或单音复合的汉字为单位,还是保持着“单音节孤立语”的风格,然而汉语的表达却进入了无往而不利的境界。造成了上述的几次质变的原因,有社会生活的进展对语言的需求和促进,有使用汉语的人群的心智、精神的深化发展的推动,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便是汉语和汉字之间的互动互谐,也就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内部的矛盾和统一,汉语汉字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辩证法的这一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 [1]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 [2] 程湘清. 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4] 高本汉. 中国语言学研究[M]. 贺昌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 [5] 高本汉. 中国语与中国文[M]. 张世禄,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1.
- [6] 郭绍虞. 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7] 郭锡良. 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C] // 古汉语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8]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9] 胡明扬. 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10] 刘坚, 江蓝生. 宋语言词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11] 吕叔湘. 语文常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 [12] 潘悟云. 汉语历史音韵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4] 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 [15]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6] 伍宗文. 上古汉语复音词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17] 向熹. 简明汉语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18] 徐时仪. 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19] 赵克勤. 古代汉语词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20] 周宁. 世纪中国潮[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曹瑞芳)